

阿尔及利亚政治体系的变迁

慈志刚

内容提要 阿尔及利亚政治体系的选择始于该国民族解放斗争时期，国家独立后正式予以确立。在沙德利时期，政治体系出现危机并导致军人干政；泽鲁阿勒执政后政治体系进入调整阶段；布特弗利卡时期取得了明显的成果。阿尔及利亚的政治体系结构呈现出 3 个层面：主导力量、直接影响力量和间接影响力量，其结构特点是以军政体制为基础，民族主义革命为合法性来源，经济建设为根本保障，开放性和适应性不断增强。这一体系在政治、经济、社会和制度等方面不断完善，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关键词 阿尔及利亚 政治体系 布迈丁 沙德利 布特弗利卡

作者简介 慈志刚，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博士生（西安 710069）。

阿尔及利亚的政治体系是在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中形成的，反映了该国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主要内容，并表现出了独特的政治文化特点。在独立后的政治发展过程中，阿尔及利亚的政治体系根据社会发展不断作出调整，并为此付出了惨痛代价，政治体系的变迁反映了阿尔及利亚政治发展的本质内容。从政治学角度来看，政治发展是原有政治体系不断调整和新政治体系逐渐生成的过程，对政治发展的立体剖析和动态描述是相关研究的方法论内涵。本文从这一角度出发，通过对阿尔及利亚政治体系变迁的梳理，分析政治体系的结构和特点，从而对该国政治体系变迁作出综合评价。

阿尔及利亚政治体系的建立及发展

独立之初，阿尔及利亚进行的第一项工作并不是恢复遭到多年战争破坏的社会经济，而是填补殖民者撤离所造成的权力和政治制度真空。由于革命年代缺乏统一的革命意识形态、没有深孚众望的领袖，并存在派系之间斗争，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独立初期，¹ 导致民族主义领导人之间

的分歧日益扩大，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军区指挥官和民族解放军是国家权力的有力竞争者。最终在布迈丁的支持下，本·贝拉当选为国家首任总理，他在制宪国民会议上重申了《的黎波里纲领》的社会主义原则。在其后通过的阿尔及利亚宪法中，本·贝拉试图巩固自己的权力，他将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武装部队统帅的职权集于一身，并当选为唯一合法政党——民族解放阵线总书记。随着权力不断集中，本·贝拉与其支持者内部发生了矛盾，特别是他所推行的政策逐渐失去民心，最终导致布迈丁发动政变，并终结宪法的实施。从本·贝拉到布迈丁之间的权力过渡异常平静、顺利，一切政治权力掌握在布迈丁及其“乌吉达集团”手中。新政府承诺：通过合法机构制订的国家体制，将使人们的意志得到体现和产生一部符合革命原则的宪法，从而铲除个人专断的一切祸根。^④ 实际上，布迈丁统治时期阿尔及利亚在集体领导的名义下，实行独立战

¹ See David E. Long, Bernard Reich and Mark Gasiorowski, *Th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Westview Press, 2007, p. 490.

^④ 参见《布迈丁言论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 23 页。

争时期老兵与技术专家共同治理的社会主义政治发展路线。其政治权力合法性的主要支柱是工业革命、农业革命和文化革命,在这一时期阿尔及利亚的军政体制最终确立。1976年《阿尔及利亚国民宪章》是布迈丁治国方略的一次重要调整,除了巩固民族独立和反对剥削以外,促进人类进步及其自由发展也成为阿尔及利亚社会主义的主要目标。¹在这一宪章的框架基础上,阿尔及利亚全民公决并通过了1976年宪法,该宪法强调伊斯兰是国教、共和主义是政府组织形式、社会主义是经济发展形式,同时对一系列公民权利予以保障,这部宪法表明,阿尔及利亚政治体系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有所增加。

布迈丁时代结束后,留下了比较稳定、健全的政治体系,特别是快速的工业化、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的开展,以及石油美元的增加,使人们相信阿尔及利亚拥有乐观的发展前景。沙德利在军方支持下出任国家总统,以保持政治体系的连续性。但是他在巩固个人地位以后,开始实行“去布迈丁化”的政策:在其执政初期实现了政治权力的“去布迈丁化”,政府和军队的高层遭到清洗;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对国家经济结构进行调整,开始实行自由化政策;在经济改革陷入困境以后,实行了政治结构的“去布迈丁化”,对权力进行重新分配。由于经济自由化引起的失业比例增加、贫富分化严重、国家社会福利职能削减等问题,导致人们生活状况恶化、对政府不满情绪与日俱增,最终引发了1988年的动乱。虽然动乱最终被镇压,但是它强烈地触动了执政者,沙德利在电视讲话中宣布进行全面的经济、教育和政治改革。1989年,阿尔及利亚全民公决通过新宪法,这部宪法在以下几个方面表明与过去截然不同:取消阿尔及利亚的社会主义国家属性;实行多党制,引进西方民主机制;引进西方人权观念,保障个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取消军队保卫社会主义和参与国家建设的任务,只保留保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职责等。宪法做出的调整并未带来事实上的政治竞争机制与活力,沙德利在新的权力分配中进一步扩大了自己的权力,并打破了独立以来形成的党、政、军三角权力关系。这种体系变革的短期结果就是引起人们广泛的讥讽、对国家事务不闻不

问、公民道德缺失,以及对政府及其政治制度极度憎恨。^④因此,在随后的多党选举中,伊斯兰拯救阵线异军突起,距离获取国家权力仅一步之遥,在这种形势下,军方发动了政变,沙德利发表电视讲话,宣布辞去总统职位。

1992年1月,政变不仅彻底推翻了上述改革,并重新确立了军队在政府中的核心地位。^④这一时期阿尔及利亚深陷于伊斯兰武装组织斗争的泥潭,除了将布迪亚夫和卡菲作为最高政治统治象征以外,军人主导政治的局面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1993年末,军方开始还政于民。1994年1月,泽鲁阿勒被推选为国家总统,从这时起阿尔及利亚进入了政治转型的过渡期。1996年,阿尔及利亚通过了新宪法,重申人民当家做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强调国民议会作为民主和代议制机构的重要性,但更为重要的是,新宪法赋予总统更大的权力。1997年,阿尔及利亚举行了历史上首次多党制选举,泽鲁阿勒再次当选为总统。作为过渡性人物,泽鲁阿勒与军方的分歧在所难免,特别是在如何使阿尔及利亚走出内战问题上,双方矛盾尖锐,最终导致泽鲁阿勒提前解职,并宣布进行新的总统选举。1999年,布特弗利卡成为阿尔及利亚新总统,在其第一任期内,国家的民主化程度进一步加强,政治体系吸收了更多的竞争因素和变量,虽然也不乏对其执政方式的批评(如在柏柏尔人问题上的铁腕手法等),但正如拉胡里·阿迪所说:政治反对派可以反对政府,但不可能否定整个政治体系。^⑤布特弗利卡在其第二任期内争取到了更多的自主权力,但是军方的势力仍然很大,距真正意义的民主政治尚有一段距离。2008年9月,由多个党派提出的宪法修正草案已提交给阿尔及利亚议会讨论,布特弗利卡能否继续当选并开始其第三任期还有待观察,但可以肯定的是:政治

¹ 参见《阿尔及利亚国民宪章》,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三局,1984年版,第24页。

^④ See Yahia H. Zoubir “The Painful Transition from Authoritarianism in Algeria”, *Arab Studies Quarterly*, Summer 1993.

^⑤ See *World Information: Algeria*, Pragon Publication, 2007 p. 255

^⑥ See Labouari Addi “Algeria’s Army: Algeria’s Agony”,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1998.

体系制度化将会进一步得到完善。

阿尔及利亚政治体系的 结构及特点

阿尔及利亚的政治体系经历了长期的探索、调整,走过了一条有别于东、西方的发展之路。从理论角度看,阿尔及利亚的政治发展更接近于一种混合型政治现代化模式,正如阿尔及利亚人自己描述的那样:政权既不独裁,也不民主;既不是总统制,也不是议会制,我们无法确定自己生活在一个专制体制下,还是真的在一个共和国中?¹作为探索中的政治发展模式,我们无法给予它清晰的定义,但是通过对该国政治体系结构的解析,有助于我们动态地观察和把握阿尔及利亚的政治发展趋向,况且政治体系发展本身的价值要远远超过对政治发展模式的定性分析。

(一) 政治体系的结构

由于政治文化和利益相关性的影响,阿尔及利亚各种政治力量对政治体系的发展发挥了不同的作用,根据其影响程度的不同,可以将政治体系结构划分为下列3个层面:

1. 主导力量 在阿尔及利亚的政治发展中,最引人瞩目的就是军队在干预国家政治中的独特作用,本·贝拉时期,总统与军队争夺权力,但是随着1965年政变的成功,阿尔及利亚进入军人直接统治时期。在布迈丁突然逝世后,沙德利总统开始试图调整军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在1989年宪法中规定军队只拥有军事职能,这在理论上实现了军队与政治的分离。^④在1992年议会选举之前,沙德利辞职便是他背离军队的政治理念所付出的代价。军队接管国家政权后经历一个短暂过渡期,便进行还政于民的准备工作,此后开始了军人与政治关系的调整期。作为政治调整的结果,总统正在成为政治体系中新的主导性力量。1995年,泽鲁阿勒成为阿尔及利亚历史上首位民选总统,他积极推动与反政府武装的和解。1999年,布特弗利卡在提前举行的大选中当选为总统,其早期行动主要是扩大自身权力基础以形成新的总统权威。在2004年总统选举中,军队首次作为旁观者没有进行政治干预,同年夏天开始,随着一些高级军官退役,布特弗

利卡能够对军队进行较大规模的调整。至2006年总统权力得到加强,他正在创造以总统为权力中心的新的政治体系,以保证雄心勃勃的经济改革和全国和解计划顺畅施行。^⑤

2. 直接影响力量 所谓对政治体系的直接影响是指一些精英和组织主张改变体系内的权力平衡,从而推动或阻碍原有政治体系的发展。在阿尔及利亚具备这样的能量者主要有:政府精英、较大的经济组织和有影响力的非政府组织。在1989年政治开放以前,阿尔及利亚的政府变更不是非常频繁,特别是布迈丁时期政治稳定,政府要职都是被独立战争时期的资深军人占据。但是政治开放后,总理开始对政策的得失负有更大的责任,基本上每换一届政府都要进行一次人员调配,仅布特弗利卡的第一任期就更换了6届,产生了4位总理。

阿尔及利亚的私人经济经营大多是在实行经济自由化以后涌现出来的,由于在经济改革中获得了巨大利益,因此,他们也是改革最大的支持者。1989年新宪法通过以后,出现了很多与政府改革派保持密切联系的私人商业协会,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同政府保持着政治的相关性。^⑥除了自身的实力外,这些大企业家们还与主导政治的军队和总统有血缘、家族或属地方面的联系,进而扩大了他们对政府政策的影响力。

另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是一些非政府组织,他们在新旧体系的转变中发挥着纽带作用,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就是阿尔及利亚全国工人总联合会。据工人总工会提供的数据,该联合会目前拥有200万会员,是阿尔及利亚最大的工会组织,对国家政治生活影响很大。2004年,布特弗利卡再次成功当选为总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得到了极具影响力的工人总联合会的支持。^⑦

¹ See Isabelle Werenfels *Managing Instability in Algeria: Elites and Political Change since 1995*, London and New York, 2007, p. 2.

^④ See Steven A. Cook, *Ruling But Not Governing: The Military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Egypt, Algeria, and Turkey*,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57.

^⑤ *Ibid.*, p. 61.

^⑥ See Isabelle Werenfels *op. cit.*, p. 64.

^⑦ See John Ruedy, *Modern Algeria: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a Nati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287.

3. 间接影响力量 这是指对改变政治体系的力量平衡具有间接的或暂时性的影响力, 这些政治力量, 在实现民族独立后, 其中柏柏尔人的民族权力并没有获得承认, 1980年提济欧祖发生了反对阿拉伯化的示威游行, 遭到了政府的镇压。2001年春, 这一地区再次发生暴乱, 迫使政府作出让步, 并承认柏柏尔语为官方语言。柏柏尔人虽是少数民族, 却掌握多个军政要职, 这也决定了柏柏尔人问题将继续影响阿尔及利亚的政治发展。此外, 伊斯兰运动在政治体系中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在实现民族独立后, 伊斯兰教基本上采取与政府合作的策略, 接受政府的物质资助和教职人员的培训, 同时它也为国家政治的合法性进行辩护。在沙德利时期, 伊斯兰复兴运动开始兴起, 到1989年前后, 伊斯兰运动已经形成一场强大的政治浪潮, 并冲击着原有的政治体系。1992年军方发动政变。鉴于伊斯兰运动的强大力量, 政府不得不重新考虑将温和的伊斯兰运动纳入到合法的政治进程中去, 其中那赫那赫领导的争取社会和平运动(原哈马斯)在1997年全国立法选举中曾一跃成为议会第二大党,¹可见伊斯兰运动仍然是冲击现政治体系的重要力量。

(二) 政治体系的特点

在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调整与互动过程中, 阿尔及利亚的政治体系也不断进行自身的调整和变革, 深刻体现了政治传统与时代发展的融合, 与中东地区其他国家相比, 阿尔及利亚的政治体系表现出鲜明特点。

1. 军政体制是阿尔及利亚的基本政治模式。

独立之初的阿尔及利亚, 并没有立即建立起军政体系, 而是建立了以行政、军队、民族解放阵线三者相对平衡为基础的三角权力关系。本·贝拉试图打破原有的平衡关系, 将党、政、军大权集于一身。军队的权力受到威胁以后, 布迈丁以恢复集体领导的名义接收国家权力, 并建立了以军人为核心的军政体系。在布迈丁时期, 高级军官占据政府部门中的重要职位, 在经济分配中也处于特殊地位, 民族解放阵线在政治生活中仅发挥动员与宣传的作用。1979年以后, 沙德利开始清算布迈丁时代的政治遗产, 特别是1989年宪法将党、政、军三角权力关系彻底打破, 总统

的权力得到极大的提升。在政府与政党分离的同时, 军队也退出民族解放阵线, 这标志着原有政治体系的重大改变。但是这种形式上的权力变更并没有削弱军队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影响, 1992年的政变证明, 军队才是阿尔及利亚政治最后的仲裁者。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 军人干政的合法性受到质疑, 军队不得不采取“退而求其次”的战略。1999年以后, 布特弗利卡执政标志着新一轮政治权力分配的开始, 扩大总统权力和实现国家政治体系的制度化成为新一任总统努力的目标。在2004年大选中, 军队第一次对政治生活未加干预, 这是阿尔及利亚回归正常政治秩序的开始, 但这并不意味着军政体制就此结束。

2. 民族主义革命是政治体系的合法性来源。

独立伊始, 本·贝拉就以民族革命保卫者的名义进行统治。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 各种政治力量要求对革命遗产进行重新分配, 以实现对原有政治体系的冲击, 其中以伊斯兰运动的攻击最为猛烈。它认为, 阿尔及利亚的民族主义革命是伊斯兰革命, 独立之初阿尔及利亚的政治背离了伊斯兰精神, 政府在国家治理上的失败就是受到了违背伊斯兰精神的惩罚。因此, 他们主张革命的真正遗产是伊斯兰教。新世纪以来, 随着革命时代的政治家相继告别政治舞台, 以及独立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在政治体系中影响的增强, “革命”这一代表特殊历史时段的词语逐渐淡出人们的记忆。在1997年议会选举中, 议员各年龄段所占比率依次为: 1943年前出生的议员约占10.26%、1943~1960年出生的议员约占73.16%、1960年后出生的议员约占16.58%, 但是在2002年的议会中, 这三代人所占比率有了不同程度的增减, 所占的比率依次为4.12%、64.44%、31.44%。由此可见, 革命仍然作为合法性的来源, 它注定要在独立后民族国家中经历一个转型过程。

3. 经济发展是政治体系维系的保障。发展中国家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经济-政治的一元结构非常明显, 表现为: 经济系统常常从属于政

¹ 参见赵慧杰编著:《列国志·阿尔及利亚》,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年版, 第150页。

治系统,经济生活尚未与国家地区政治生活分离。¹在阿尔及利亚,经济发展最好地诠释了政治体系的生命力。布迈丁时期,国家完全控制了经济领域,实现了经济生活国有化,在1967~1978年间国民生产总值以年均7.2%的速度增长。布迈丁时期的经济发展为国家政治体系的稳定提供了坚实基础。但是到了沙德利时期,经济状况恶化,特别是国际原油价格骤降,迫使沙德利政府推行经济自由化的政策。事实证明,这样的政策并不成功,经济自由化没有为国家的政治稳定提供良好基础,国家被迫对原有政治体系进行调整,并导致了20世纪90年代持续的政治动荡。布特弗利卡执政后,一方面努力促成全国和解,帮助国家走出战争的泥淖,另一方面利用良好的国际环境大力推进经济改革,阿尔及利亚的政治生活也因此恢复了活力。

4. 政治体系的适应性和开放性不断增强。

在本·贝拉时期,政治上的权力分配以革命斗争为基础,军人占据了所有重要部门,这一时期,政治体系的排他性表现得最为突出。到布迈丁时期,国家独立后的政治体系初步形成,在国家治理中統合了更多的社会力量,在经济上能发挥重要作用的技术专家在政府中已经开始占有一席之地。布迈丁时期成功推动了经济的发展,社会和政治的变迁便随之而来,^④《阿尔及利亚国民宪章》和1976年宪法的出台是布迈丁顺应时代而草拟的发展蓝图。但是布迈丁逝世使其政治理想没能实现,沙德利政府开始调整布迈丁时期的各项政策,长期以来潜伏的社会力量也开始形成对政治领域的冲击。1989年阿尔及利亚颁布新宪法,试图通过开放政治体系来缓解社会的不满,结果却导致一场旷日持久的混乱。从泽鲁阿勒到布特弗利卡,阿尔及利亚的领导人在恢复社会稳定的同时增强了政治体系的开放性,虽然国家宪法(1996年宪法)规定政党的成立不得建立在宗教、地区和种族基础上,但是温和的伊斯兰政党还是取得了合法参与国家政治的权力。

阿尔及利亚政治体系的综合评价

政治体系的演变是政治发展进程的一部分,

最终目的应是推动社会的全面发展,对阿尔及利亚政治体系的评价亦应遵循这一原则,并反映在政治、经济、社会和制度等层面。

(一) 民族国家的构建

阿尔及利亚在历史上经历了长期的殖民统治,独立后便同时面临两大难题,即国家政治现代化与民族国家构建,由于特殊的经历使二者几乎同步进行,并把民族国家的构建转化为政治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和有机组成部分。^(四)阿尔及利亚民族国家构建的主要任务是:完成从传统的对部落、教派和种族的效忠向现代民族国家认同的转变。在本·贝拉和布迈丁执政时期掀起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浪潮,国家通过发展经济来换取人们对参与政治的热情。但是到了沙德利时期,随着经济形势的急转直下,社会两极分化严重,国家成为矛盾的聚焦点,1982年在君士坦丁举行的一次学生和青年的示威游行演变为暴力冲突,任何反映国家权威的标志都成为破坏目标。此外,柏柏尔人问题也是困扰阿尔及利亚民族国家构建的问题之一。由于独立之初国家否认柏柏尔人的民族特性,并掀起了声势浩大的阿拉伯-伊斯兰化运动,阿拉伯语化成为民族问题的焦点。当前柏柏尔人在争取民族权力上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距离问题的最终解决还有漫长的路程。民族国家构建是困扰政治体系建设的难题之一,处理得当与否关系到国家现代化转型的成败,从总体趋势来看,阿尔及利亚的民族国家构建正在向积极的方向发展。

(二) 经济-政治一元化模式的调整

实现经济快速发展是新独立民族国家首先面对的问题,也是独立后政治体系必要的合法性来源。在现代化启动的早期,经济发展为政治统治提供了合法性基础,随着现代化的深入,现代性元素开始渗透到政治体系中,在某种程度上经济发展又在消蚀着政治的最后避难所,这种经济和政治的失衡发展是很多新独立后民族国家共同的

¹ 参见施雪华著:《政治现代化比较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35页。

^④ 参见[美国]霍华德·威亚尔达著;刘青、牛可译:《新兴国家的政治发展——第三世界还存在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8页。

^(四) 参见施雪华著:前引书,第34页。

现象。阿尔及利亚独立后经济上推行“进口替代”的经济民族化战略，将大量资金投入到了生产自给所必需的重工业领域。随着经济快速增长，政治体系也更加稳定，形成了独立初期的经济—政治一体化模式。始于沙德利时期的经济自由化破坏了原有的一元化模式，大批国有企业转让给私人手中，这一政策非但没有解决经济上的诸多难题，反而弱化了国家的政治基础。自从1989年政治体系开放以后，民众对国家制度和政党政治失去了信心，街头政治活动更加频繁。2000年夏，由于对苦苦等待的低收入住房分配的质疑、购买力日益下降、生活条件恶化、教育和健康服务质量，以及日益增加的失业问题，引发了一波反对地方和中央权威的群众抗议浪潮。¹当前，阿尔及利亚面临的难题是既要实现向市场经济的成功转变，又要使之能为政治体系的稳定提供新的基础。

（三）社会政治结构的分化

社会政治结构的分化是国家政治和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殖民统治的遗产之一就是给阿尔及利亚留下了一个以土著居民为主的趋于同质化的社会结构，经过布迈丁执政期间的稳定发展，阿尔及利亚社会结构开始出现分化，国家政治也通过修改宪法而作出适时的调整。到了沙德利时期，僵化的政治体制开始无法压制涌动的社会力量，最终导致再次修订1989年宪法，将社会力量释放的途径合法化。从这一时期开始，社会政治结构的多样性才真正得以体现，出现了不同类型的政治组织：以家族、教派和种族为基础的组织，如民族改革运动党属于温和的伊斯兰政党；以职业和功能为基础的组织，如众多的商业联合会和文化组织；以经济地位为基础的社会组织，如大量工人组织的出现。成功的执政应该能够将社会精英纳入政治体系，从而将各种社会力量疏导到政治现代化进程中。阿尔及利亚在这样的道路上曾经历了痛苦转型，各种社会组织对政治决策的参与已经影响到政治体系如何运转，只有政治体系的调整与社会结构的变革保持平衡才能推动政治生活的良性循环。

（四）民主化机制的生成

政治体系的发展成果最终会以制度化形式保

存下来，而政治制度改革可以推动政治体系的进一步完善。1963~1996年，阿尔及利亚先后实施了4部宪法，每部宪法都是前一时期政治发展经验的总结，同时也是应对形势变化作出前瞻性的展望。在宪法更迭中，阿尔及利亚政治体系由独立初期较强的排他性向开放性转变，军政体制也向民主政治过渡。1989年宪法第三十九章赋予了公民言论、结社和集会等自由权利，一时间出现了大量的社会组织和独立媒体，使人们对未来的议会选举充满了期待。虽然后来选举结果被取消，但1989年宪法开启的民主化趋势并没有因此而停止，1996年宪法承认了公民所拥有的基本权利。如今，阿尔及利亚的言论自由是阿拉伯世界最为开放的，这也是该国民主化进程的成果之一。经过布特弗利卡的两个任期，阿尔及利亚逐渐恢复国内和平，政治体系的稳定性增强，目前，新的宪法修正案已经提交议会，这些政治进程中的新成果肯定会在宪法中得到体现，学者们也在尝试用新的词语，如“威权自由主义”等来重新定义阿尔及利亚的政治体系特征。

综上所述，政治体系的能力取决于执政者能否推动政治、经济、社会和制度等层面的全面进步，并作出适应时代的调整。由于阿尔及利亚独特的现代化道路，独立以来奉行的赶超战略造成了政治与社会总体结构，尤其是与经济关系的不平衡，政治体系长期处于滞后状态，最终成为国家发展的障碍。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治领域的突然开放又证明，政治体系调整超越了政治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也是一条行不通的路径。此后，阿尔及利亚实行了对政治体系渐进式的改革，在恢复国家秩序的同时，也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动力。阿尔及利亚的政治历程说明，一个伤痕累累的国家政治体系躯体无法担负起国家发展的重任，这样的教训与经验值得学者深思。

（责任编辑：邢永平 责任校对：安春英）

¹ See Massoud Karshinas and Valentine M. Moghadam, *Social Policy in the Middle East: Economic, Political and Gender Dynamics*,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p. 99.